

车田人民光辉历史的一页

—— 纪念解放车田 50 周年

邓达生

车田，位于龙川县中北部，西南边界与和平县接壤。车田文化发达，解放前有完全中学一所，中心小学一所以及三所完全小学；商业兴旺，墟镇有店铺数十间，每逢墟日赶集者近万人，是川北与和平边境集市贸易中心。

解放前夕的车田四面受敌，东南面有国民党龙川县大队副大队长谢洪恩兵力常驻黎咀墟；西面有国民党广东省保五团和当地反动势力布防和平县贝墩墟；北面有实力较强的国民党联防队驻守贝岭墟。在这样恶劣环境下，车田人民在中共九连地委、川北工委和粤赣湘边纵队、东二支队领导下，深入开展艰苦对敌斗争，终于在 1949 年 4 月 13 日（农历三月十六日）解放车田。这对威慑瓦解敌人，推动全县乃至东江各地解放，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大造革命舆论，为解放车田创造思想基础。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巩固其反动统治，大造反革命舆论，

到处涂写“ 勘乱救国 ”、“ 通匪者杀 ”等反动标语。鉴此，中共川北工委和车田支部及游击队，针锋相对地密写标语，散发革命传单，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我当时在车田中心小学任教（担任音乐、数学兼搞财务），抓住合法机会，积极教唱江西苏区流传进来的革命歌曲。记得有一首“ 江西小调 ”，歌词是：“ 钱子溜溜光，百姓卖早粮^①，穷人要想好日子过，就得翻身求解放…… ”。这首歌悠扬动听，学生和群众都很喜欢唱，甚至离中心小学不远的“ 当铺 ”内驻扎的敌联防队士兵，也暗地里唱起这首歌，师生们的歌声，传遍每个乡村角落，这对和平解放车田，在思想舆论上打下了一定基础，发动了群众，提高了乡亲们翻身求解放的觉悟。

二、智留仓库皇粮，为解放车田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

解放前，龙川县在车田设有一个皇粮仓库，每年能征收公粮万担以上，主要解决国民党县府行政与部队的经费和粮食供应。1947 年以前，仓库由地方有权有势的土豪劣绅掌管，防范很严。1947 年后，车田中心小学以筹集学校经费为由，报请国民党龙川县政府批准，由学校董事长邓培森挂名承接经管，具体工作由邓福其老师和我负责。到了 1948 年冬至 1949 年春，这个仓库引起了我方游击队的重视，一心想把这些粮食弄到手。显然，谁得到这些粮食，谁就掌握了主动权。为此，夺粮与反夺粮斗争非常尖锐。特别是到了

卖早粮：穷人为了度荒，谷子未成熟就以低价卖给有钱人，所谓接谷钱。

1949年春，国民党龙川县大队几乎天天催要发粮，因邓培森同志及时把情况向部队领导林镜秋同志作了汇报，大家一致认为，粮食无论如何不能落在敌人手里。但敌人催得日紧一日，看来不想个办法对付不行，怎么办？经过认真研究，便想出了一个缓兵之计，由我领队直闯虎穴，发动群众挑粮去应付周旋。国民党龙川县大队副大队长谢洪恩看见我和群众挑粮来了，喜形于色，龇牙咧嘴地说：“我等你们的粮食等到发慌，一朝无粮不住兵呀！不但我们要粮，而且县府也老是催要粮哩！”接着他又问我发来多少粮食，我说：“今天发了十担。”这家伙一听火了，两眼直瞪，吼道：“你们不怕死了！皇粮敢不发？今天你们弄来这些粮食，还不够我们吃一天，你们不怕杀头吗？”其实我早有思想准备，等他气呼呼地发过脾气后，就慢慢地对他说：“大队长不要生气，你们要粮我们是清楚的，我们也日夜发动乡民挑粮，甚至给他们增加运费。但是他们都说，一年三春景^①要紧，现在正是春耕大忙，哪有时间来送粮呢？甚至有人骂：你们是吃饭的，还是吃泥巴的，现在春耕大忙，都不知道吗？”我发现他边听边皱眉头？怒气有所缓和，紧接着说：“大队长，不是我们不发粮，而是农户们确实忙呀！我看等到农事稍闲就发粮来。”谢洪恩听我这样解释，认为颇有道理，不再发火了，就说：“行了，行了，农事稍闲你们就大量发动乡民运粮。”接着他把手一挥，“你们回去吧！”就这样编造一套理

三春景：即春耕；夏收夏种；秋收冬种。

由，哄骗过去。其实未到春耕结束，车田就胜利解放了，这些粮食回到了人民手里，除了保障部队需要外，还开仓济贫。群众异常兴奋，声声感谢共产党，人人感恩人民解放军。截留皇粮成功，为和平解放车田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三、车田解放与敌人反扑。

1949年4月13日（农历三月十六日）是车田解放的大喜日子，那天由国民党乡联防中队长邓鸿恩、副中队长陈德忠带领士兵起义，并与民主人士，乡长邓巨青等起义人员和群众、学生迎接人民解放军的到来。是日上午，当东纵二支队司令员郑群、团长林镜秋同志率领解放军部队，排着整齐队伍，高唱革命歌曲，浩浩荡荡开进车田时，鞭炮齐鸣，锣鼓喧天，群众欢喜若狂，人们高呼：车田解放了！这一消息就像精神原子弹在敌人心脏爆炸。敌人像热锅上蚂蚁，急得团团转，惶惶不可终日，企图把这股革命之火压下去。几天后，国民党龙川县大队长黄道仁和副大队长谢洪恩，纠集贝墩国民党省保五团和贝岭墟联防队围攻车田，进行反扑。但他们彼此深知末日来临，人民解放军不好惹的，敌方各有谋算，各怀鬼胎。他们原来打算兵分三路，其实贝岭墟联防队从北面扑来，遭我人民解放军川北朱文和及杨荣烈中队伏击，枪声一响敌人夺命溃逃。西面贝墩墟敌人不敢妄动，没有来，只有谢洪恩带领一伙人赶到车田墟外围，当天下午驻扎坪塘村，他们害怕人民解放军围歼，为虚张声势，向车田老“当铺”（原为乡联防中队部住地）附近发射两颗六零炮

弹，第二天再往空中放了几枪，就狼狈不堪地向贝岭墟逃窜。敌人的反扑阴谋，结果以失败而告终。我军在敌人反扑那天，处决了带队投敌的叛徒杨学赞，大快人心。

四、热烈庆祝车田解放，群众踊跃参加革命。

解放车田，即日成立乡人民政府，几天后举行了盛大的，解放车田庆祝大会，当时有万余名群众和学生参加，我负责司仪，大会主要由林镜秋同志讲话，他宣讲革命道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动员各行各业积极做好工作，迎接解放大军南下，解放全中国。还有各界代表讲话。会场秩序井然，锣鼓鞭炮声齐鸣，气氛非常热烈。大会结束时，用缴获的国民党迫击炮鸣炮庆祝，炮弹落在火甲嶂山上爆炸，大家热烈鼓掌叫好。车田的解放，意义深远。不但为东江各地的解放树立了榜样，而且激发龙川北部有志青年积极参加部队，走向革命道路，甚至在学的中学生踊跃报名参加部队或赴粤赣湘边纵队举办的“东江公学”学习，仅车田地区就有数百人之多。这些同志后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英魂长眠鸳鸯坑

——记曾被毛泽东赞扬过的古柏同志

谢全建

一个英魂长眠在龙川县上坪镇鸳鸯坑的崇山峻岭中。斗转星移，世事变迁，六十多年来，红土地上的人们仍记得烈士的英名，毛泽东曾经赞扬过的中国工农红军著名将领，我党早期革命活动家，闽粤赣游击纵队司令古柏。

在建党 80 周年前夕，记者冒雨前往龙川县上坪镇青化村和烈士故居，走访了 81 岁的老游击队员刘权芳和烈士的亲人、退休干部古安健以及龙川县党史办黄义同志，并到寻乌革命烈士纪念馆查阅了相关资料。

1906 年 12 月 9 日，古柏出生在与龙川县上坪镇仅一山之隔的赣南寻乌县篁乡塘背村司马第（现晨光镇沁园春村司马第）。早年的古柏接受了马列主义，在梅县求学期间，就结识了共产党员张维、洪剑雄等人，见到了周恩来、邓颖超，从此立志革命，积极参与反帝爱国运动，成为梅县地区学生运动的领袖。1925 年 12 月，古柏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

党，接着先后领导发动了梅县暴动和寻乌“三·二五”暴动。

1928年9月，根据中共赣南特委的指示，古柏与钟锡球、李大南、朱家祯等人在寻乌黄沙西云庵成立了寻乌县第一支地方武装——二十一纵队，古柏任政委、钟锡球为队长，以阳天嶂大山为依托，在粤赣边境的龙川、兴宁、寻乌一带开展艰苦卓绝的游击斗争。

1929年1月31日晚，古柏、钟锡球、李大南、李大添、侯大风等在离上坪12公里的菖蒲坪第一次与毛泽东、朱德会见。古柏向毛、朱详细汇报了寻乌党组织开展群众工作，领导“三·二五”武装暴动及受挫后撤到阳天嶂打游击的情况。毛泽东见眼前这个小伙子眉清目秀、英姿勃勃，很是高兴。他说：“目前我们确实还很弱小，敌人很强大，可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道路虽坎坷，前途却是光明的！”他鼓励古柏等人：“你们搞得很不错嘛！今后要进一步发动群众，扩大革命武装，开展土地革命，有计划地建立革命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

朱德也高度赞扬古柏等人领导的武装斗争，并勉励大家：“失败是成功之母。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旗帜，要坚持开展武装斗争，坚持就是胜利！”

古柏全神贯注地听着，深深地为毛泽东、朱德那远见卓识、深刻感人的话语所吸引。

1929年春节过后，古柏根据毛泽东、朱德的指示精神，率领赣南挺进队队长李大添来到龙川细坳黄麻布乡，与东江

红军独立团政委罗屏汉一起，发动群众，扩大与巩固中央苏区游击根据地和恢复发展龙川苏区，以牵制广东军阀北上配合蒋介石夹击中央苏区。他们到龙川后，即发动当地革命青年刘观文、刘丕栋、刘昌杰等秘密串连，组织农民建立赤卫队，在上坪青化地区牛角龙办练兵场。3月，在回龙大塘肚成立了“闽粤赣边五（华）兴（宁）龙（川）县苏维埃政府”，进行按人分等计口分田。当年冬，龙川县警大队长蔡雷鸣、地方中队长刘国亮纠合兴宁、五华、平远、和平五县武装共1800多人，实行所谓“五县大会剿”，兵分三路袭击大塘肚。敌所到之处，奸淫掳掠，烧屋杀人，军民损失惨重。

中央苏区对大塘肚的惨遭洗劫甚为关切。古柏也认为发展与巩固龙川苏区对中央根据地有着重大意义。1931年4月，古柏再次来龙川，慰问与指导苏区工作。其时适逢五兴龙苏区正在恢复生产和斗争，中共五兴龙县委举办党政干部学习班，古柏为全体学员讲课。他特别强调：一个革命干部要过好政治、思想、社会、生活、家庭等“五关”。他还在钟旭日家中住了10天左右，到附近的园田等几个苏区乡村作社会调查，访贫问苦，临别时又特为大塘肚苏区军民挥毫赠诗一首：“已经革命掀高潮，要有坚贞不屈挠；任你飘摇多挫折，中流矗立阻波涛。风餐露宿皆欢受，弹雨枪林莫惧劳；故土家乡休恋念，与民团结共同袍。”并派红四军一个营的兵力与当地赤卫队100多人，分驻黄麻布乡等三个据

点，袭击团防。不久，红军与赤卫队向贝岭、麻布岗等地扩展，建立了阁前乡苏维埃政府及红军后备队，上坪青化地区陈信中、刘阳明、刘仕俊、刘鸿儒、刘绍棠、刘绍宗、王光海、刘水清等几十名青年参加了红军。

1929年11月2日，古柏在阳天嶂成立寻乌县军事委员会和中共寻乌县委员会，并担任主任委员、书记。1930年四五月间，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会昌进入寻乌，再克寻乌县城，接着在古柏的陪同协助下，经过20多天的走访，毛泽东完成了一项社会调查，这就是后来成为马列主义重要文献的《寻乌调查》和《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在《寻乌调查》序言中写道：“在全部工作上帮助我组织这个调查的，是寻乌党的书记古柏同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名言，就是出自寻乌调查后形成并收入《毛选》的《反对本本主义》。

经过寻乌调查，毛泽东对古柏有了极好的印象。1930年8月，毛泽东将古柏调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古柏成了毛泽东的得力助手。随后，古柏跟随毛泽东左右，南征北战。毛泽东在《木口村调查》一文中记述：“1930年11月18日，红军放弃吉安。19日我和古柏、谢唯俊二同志从吉安往永丰属之藤田，会合红军主力。21日经水南到白沙，在木口村吃午饭，调查了村政府委员的成分及本村所杀反动分子的成分。”

1931年9月28日，毛泽东等人率苏区中央局机关和方

面军总部从兴国水头庄进驻瑞金叶坪村，古柏、曾碧漪夫妇和毛泽东、贺子珍同住谢氏祠堂。此期间，曾碧漪、贺子珍协助毛泽东收发、保管文件，破译密码、抄写材料；古柏为毛泽东起草文件，并与毛泽东一起研究、处理总前委的许多重大问题。古柏那一手清秀的毛笔字，深得毛泽东赞赏。

但是，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在中央苏区实行宗派主义干部政策，把古柏调离总前委到地方工作。1933年初，“左”倾错误领导人又在苏区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坚决执行毛泽东正确主张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被冠以所谓“江西罗明路线”代表而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后来，毛泽东在延安回想起这段历史时说：“所谓反邓毛谢古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实是指鸡骂狗，是反对我的！”

1933年9月开始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由于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坚持一年多终于失败，红军主力被迫于1934年10月实行战略大转移——长征。18日傍晚，毛泽东踏上于都西河上的浮桥，随中央第一纵队告别中央苏区的父老乡亲，离开战斗、生活了五年又十个月的赣南大地。古柏被任命为闽粤赣游击纵队司令，奉命留下与项英、陈毅、贺昌、阮啸仙等人一起，在赣南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在于都分手时，毛泽东把1933年夏在瑞金时作的这首词——《菩萨蛮·大柏

地》赠给古柏。

古柏率领一支红军队伍在于都、安远、寻乌、龙川一带打游击，牵制敌人。

1935 年 1 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3 月下旬，古柏按照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发来的二月指示，奉命南下东江地区传达会议精神。

于是，古柏身穿棉袄，腰别“曲尺”（驳壳枪），由一位姓廖的同志陪同，率领十余名挺进队员，从江西安远出发，爬山涉水，来到龙川县上坪镇青云村鸳鸯坑，驻扎在五兴龙游击大队活动的地下交通站一间纸厂。同志们见到古柏后十分高兴，都亲切地称呼古柏同志。古柏笑着说：叫我“柏花”好了。一连几天，古柏召开会议，向大家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研究下一步工作，选定以上坪青化地区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坚持开展游击斗争。

交通员王应湖负责游击队员们的伙食：买菜、荅谷。没几天，王应湖又要荅一担稻谷，引起纸厂老板、地主王福均怀疑：厂里只有几个工人，为什么这么快又要荅谷？

王福均尾随王应湖，来到竹林中的纸厂，发现驻有红军游击队。

王福均说王应湖通“匪”，逼他向乡公所报告。王应湖贪生怕死，当了叛徒，到上坪乡公所向副乡长王敬卿告密。王敬卿说：“叫他们离开上坪算了。”王应湖走后，他又改变

主意，向县警队电告。

4月8日（农历三月初六）拂晓，驻上坪圩的龙川县警大队第三中队第三小队队长黄居成和驻贝岭的第三中队黄卓小队率领近百名自卫队员，分别从坳下和窝坑包抄过来，突袭鸳鸯坑纸厂。在这危急关头，古柏立即率队突围。激战中，古柏与两位战士不幸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是年，古柏年仅29岁。

古柏中弹倒下后，敌人从其身上搜出一只空信封，写着“古柏同志收”字样。敌兵走后，当地群众自行将三位烈士的遗体掩埋。从此，古柏同志的英魂永远长眠在青化革命根据地的崇山峻岭中。

1937年秋，在延安的毛泽东获悉古柏牺牲的噩耗后，深为痛惜，他在一张宽约20厘米、长30厘米的洁白宣纸上挥毫题词：

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遗志，共达自由解放之目的！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亲自为在江西中央苏区被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打击迫害的“邓、毛、谢、古”四位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直至建国后，杀害古柏烈士的凶手仍未归案，这一直是曾碧漪的一块心病。1956年，毛泽东指示公安部严查。几个月后，王应湖、王敬卿、王福均被枪决。

1984年7月4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为“古柏烈

士纪念碑 ” 题字。

1986 年 3 月 6 日，坐落在寻乌县城镇山园镇山巅的古柏铜像落成揭幕。铜像背后是一墙寻乌 “ 三 · 二五 ” 暴动浮雕。

东纵北撤后的一百天

王彪口述 叶惠南笔录

《停战协定》达成后，东江纵队北撤山东。根据南方局指示精神，决定执行协议，北撤山东的同时，留下武装骨干坚持斗争，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国民党反革命两手的策略。

东纵于 1946 年 6 月中旬集中北撤。撤离前，第三支队从两个主力大队挑选出五十多名指战员，留下轻机枪两挺，长短枪五十多支，在九连山地区，成立了“连和人民自卫总队”，总队长王彪，政委吴毅，副总队长陈实堂，政治部主任林镜秋。我们奉命择地隐蔽，暂不公开活动。起初秘密转移到江西定南、龙南边境深山里隐蔽约半个月，因粮食困难，于七月中旬又回到广东境内九连山地区来。

九连地区驻敌六十二军大部已撤，仍留下兵力搞清乡活动。我们决定由王彪率手枪队十多人，突围到河源、老隆一带与地方党取得联系进行活动，其余留在九连山继续隐蔽。手枪队突围后，昼伏夜出，以东纵复员军人名义，发表宣言，反清乡、反迫害，警告地主豪绅和伪乡保长，不准迫害

群众，对敢于继续杀害群众的反动分子，则坚决镇压。河源船塘的伪乡长欧阳超凡，作恶多端，群众恨之入骨，手枪队将他镇压后，船塘、上莞一带的伪乡保长，都老实起来，有的还同我们搭线，掩护我们活动。手枪队活动到老隆一带，经过严密侦察，决定袭击敌人的金融机构——老隆银行。后因行动暴露未达目的。但也迫使敌人不得不收缩兵力防守，减轻对九连山的围剿、封锁。为了不拖累群众，队伍只好昼夜隐蔽在深山老林里，天晴时，在山头设个了望哨，战士们用被单连头到脚裹起来，防山蚊毒蝇叮咬，卷缩在石板上睡大觉，战士们自嘲为“吃荷包蛋。”遇上下雨，战士们戴上竹笠，用油纸、山芭蕉叶披在肩上，背靠背坐在树下，战士们自嘲“吃冬笋炖滑鸡”。遇上暴风雨，竹帽戴不住，油纸芭蕉叶也披不住，战士们索性站起来，迎着狂风暴雨，放声歌唱，顿时山鸣谷应，气壮长虹。这种天当房，地当床的露宿生活，使伤风感冒、打摆子的病号逐日增加。我们决定在深山搭山厂，战士们动手砍竹伐木、割草，很快山厂搭起来。住进山厂后，就开始学习，不但读书写字学文化，还上政治课，政委经常讲革命战士气节，革命斗争的前途，讲东纵打日本鬼，打“呵呵鸡”战斗故事，鼓舞大家坚定斗争的胜利信心。战士虽然肚子饿得咕咕响，却也听得津津有味，情绪很高。

隐蔽活动初期，依靠北撤部队留下来的钱向山里群众买粮食、薯片、芋头干来维持生活。后来钱用光了，甚至有钱

也买不到粮食，战士们就采野果来充饥。没多久，不少人肠胃不适应，腹胀、拉肚子、患水肿病和夜盲症的人也多起来。在这断粮的日子里，战士们都坚决执行群众纪律，从不挖群众的地瓜芋头，从不采摘群众的蔬菜。为了解决粮食困难，队伍又转移到粤赣边深山老林去，并派陈桂友、江培荃带上仅存的一个金戒指化装下山，通过堡垒户赖日阳换来一斗米和十来斤番薯片。又找到江西省三亨乡“白皮红心”的乡长和热水的黄新同志，搞来一些粮食，队伍每天用少量粮食和野菜、竹笋煮稀饭过日子；不久，反动派竟将堡垒户赖日阳杀害，黄新同志的妻子也被抓去，妄图割断我们与群众的联系，困死我们。当时，由于东纵北撤部队尚未到山东，怕大干起来，给敌人制造借口，影响北撤部队的安全，因此，无论怎么困难，我们仍是隐蔽为主，等待时机。

九月中旬，九连山四乡的国民党军队撤退了。我们派人到青山惩办了一个罪大恶极的反动豪绅，这事在四乡传开来，群众知道红军还存在，渐渐大胆和我们联系接近，我们开始又在九连山活动起来。从六月中旬到九月底，部队在深山老林隐蔽了三个多月，在这一百个日日夜夜里，指战员团结一致同敌人斗，同疾病斗，同各种各样的困难斗，终于坚持下来。九月三十日，交通员带回了《华商报》报导，东江纵队已安全到达山东烟台，这一特大喜讯使同志们顿时欢腾起来，大家说：现在该是干的时候了。”这时国民党在东北、华北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反革命内战。我们立即派几个同志到

江西古坑密林里，起出秘密埋藏的部分武器、擦拭干净，作好战斗准备，十月初，部队集中在和平东水赵公庙，公开打出“连和人民自卫总队”的旗号，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打击敌人，积极开展革命斗争，在九连工委领导下，部队逐渐发展壮大，于 1948 年秋，建立了粤赣湘边纵队第二支队，鲜红战旗插遍了东江流域。

注：黄彪同志是原广东省军区顾问。